

绪 论

二十多年前我出版了一本有关当时欧洲历史学研究状况的小书，书中我说明了学术研究的传统形式是怎样地被更新颖的历史研究形式所取而代之的。①所有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大抵都同意，自从十九世纪初期国际上就开始作为一种专业规范在运用着的那种历史研究方式，已经是既不符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政治状况，也不符合现代科学的要求了。同时，有关历史的和历史学的观念，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本书不应该看做是一部续编，即——可以说是——要把我 1975 年的著作写到今天。反之，它主要地是涉及从当今历史学家们思想中和实践中所挑选出来的某些基本变化。尽管有许多旧式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形式还在继续着，然而已经发生了一场基本的重新定向。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自从十九世纪以历史学作为一种专门学术的出场为其基础的那种历史学的研究与写作的种种假设，就日愈受到了人们的质疑。有许多这类假设都要追溯到西方历史学从古典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的那个传统的开端。十九世纪的

新事物则是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及其集中到大学里和研究中心里。而成其为专业化的核心的,则是对历史学的科学地位的坚定信念。历史学家所理解的‘科学’这一概念,肯定地是与自然科学家所理解的大不相同,自然科学家追求的乃是概括化与抽象定律的形式的知识。对历史学家们而言,历史不同于自然,因为历史学处理的乃是表现为创造了历史的男男女女们的意愿以及使社会得以凝聚的种种价值和风尚。历史学处理的是在时间中的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文化。然而历史学家们一般地也都在分享各种专业化科学的那种乐观主义,亦即受控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就使得客观的知识成为了可能。对于历史学家们也像对其他科学家一样,真理就在于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那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便是‘要像它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②建构过去。历史学这一自我界定之作为一种科学规范,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就蕴涵着科学话语与文艺话语、专业历史学家与业余爱好者双方之间的严格区分。历史学家们忽视了事先就在决定着他们研究结果的那些有关历史行程与社会结构的各种假设。

然而,历史学之转化为一种制度化了的规范,却决不可引导我们忽视古老的历史写作形式的连续性。十九世纪的历史学是处于要上溯到古典希腊古代的伟大历史学家们的那种传统之中的。他们和修昔底德一起分享着对于神话与真实的分野,同时尽管他们强调历史著作之科学的、因而是非修辞学的特性,但却循着历史写作的古典传统在前进着,在设想历史总是作为一种叙述而被写下来的。然而正如海登·怀特(Haydn White)^③和最近其他一些史学理论家已经指出了的,历史叙述的问题就在于:虽说它是由经验所认定的事实或事件出发的,它却必然地需要

有想象的步骤来把它们置于一个完整一贯的故事之中。因此，虚构的成分就进入到一切历史的话语之中。

因此,十九世纪‘科学的’的历史学和古老的历史学的文艺传统之间的断裂,一点也不像许多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大。“科学的”历史学话语就包含有文学的想像在内,而古老的文学传统也是在重建真实的过去之中寻找真理的。自从利奥波尔德·冯·兰克以来,‘科学的’取向就和从修昔底德到吉朋的文学传统共有享有三项基本的前提:(1)他们都接受了真理的符合论(Correspondance Theory of Truth),认为历史学是描绘确实存在过的人和确实发生过的事。(2)他们都假设人的行为反映了行为者的意图,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要理解这些意图以便重建一篇完整一贯的历史故事。(3)他们是随着一种一维的(One-dimensional)、历时的(diachronical)的时间观念在运作的,其中后来的事件是在一个完整一贯的序列之中随着较早的事件相续而来的。这些有关真实性、意图性和时间序列的前提,就决定了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到兰克与从兰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历史著作的结构。而正是这些前提,在最近的史学思想中却逐渐地受到了质疑。

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二十世纪的史学思想中区别两种十分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探讨由十九世纪的专业历史学所特有的那种叙事的、朝着事件定向的历史学之转化为二十世纪朝着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研究与写作的形式。传统历史学的基本前提受到了挑战,但是上述的根本前提却始终并未触及。各式各样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织就成从定量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年鉴学派的结构主义直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那样一道

方法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光谱。所有这些研究路数都以不同的方式都力图使历史研究更加紧密地把自然科学当做范本。当传统的历史学把焦点聚在个人的作用上与意向性的各种因素上而反对简化为抽象的概括化时,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的新形式则是强调各种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历程。然而它们却分享着更古老的历史编纂学中两个关键性的观念。其一是肯定历史学研究的乃是一个真实的主题,而历史学家所总结出来的叙述必须与之相符。这种真实必须承认是不可能直接为人掌握的,而是像所有的科学一样,它们也必须以历史学家的概念与心灵结构为其中介;然而历史学家的目的却仍然是客观的知识。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路线在如下几点上批判了老式的历史编纂学。他们论证说它是太狭隘了,只把注意集中在个人、尤其是‘伟人’的身上以及那些构成了历史学主题的事件上,而忽视了他们或它们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个更广阔的语境。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的研究路线,——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巴尔逊(Talcott Parsons)式的还是年鉴派的,——都表现出历史学的一种民主化,它包罗有更广泛的各色人等并把历史眼光从政治扩展到社会上而来。他们反对老式的研究路线,并非因为那是科学的,而是因为那不够科学。他们对这种古老的研究路线的一项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即,历史学是探讨个别的,而不是进行概括,它的目的是要‘理解’而不是要‘说明’,所以他们就反过来主张所有的科学,包括历史学在内,都必须包括因果性的说明。

其二是,老传统与社会科学研究路线之间也有一致的地方。双方都是以一种单线的时间观念、都是以这一概念在进行操作的,即历史是有连续性和方向性的,事实上在与各种不同的历史

学的繁多性相对照而言，确实是有着历史这样一种东西的。这种历史概念在传统的老式历史学之中比起后来的各种社会科学研究路线来，采取的是另一种不同的形式。兰克已经摒弃了设想一部通史是有着一个规划的那种历史哲学观念，然而他却设想历史是有着一种内在的一贯性与发展历程的^④，而且还赋予了西方历史以一种优先的地位。社会科学派的史学家们倾向于相信，至少近代史是沿着一个明确的方向在运动的。尽管很少有人会接受那种对这一方向赋之以一种仁慈的特性的进步观念，然而大多数人都是在以‘现代化’或进步性的‘合理化’——它赋予了历史的发展以一贯性——在进行操作的。在这里，近代西方世界的历史也就具有了一种优越的地位。世界史和西方化两者是吻合的。

自从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这些假设在哲学思想上就日益受到了挑战。然而，只是到了最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这种挑战所造成的疑问才真正影响到了历史学家的工作。史学思想的这场重新定向，反映出社会与文化的根本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由兰克所开创的历史学专业的范型当其普遍地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标准时，就已经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的现实的声调不调谐了。兰克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继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之后而来的那个复辟时代的产儿。他的国家观根据的是 1848 年以前普鲁士的政治现实，那要早在代议制建立之前，也早在工业化及其社会的副产物之前。因此强调政治的首要性，相对而言，就孤立于社会经济的各种力量之外，而是几乎全然有待于国家的官方文件。到了十九世纪末叶的时候，这一范型已经成为法国^⑤、美国^⑥和其他地方历史学专业的样板，而这时候它所预先假定的

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已经根本改造过了。

到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的、比利时的、美国的、斯堪的那维亚的、甚至于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批判兰克式的范型,并在召唤着一种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了。⑦这样一种历史学就必定要摆脱把精力集中在事件和个别领袖人物的身上,转而把焦点聚在事件或伟人存在于其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民主化以及群众社会的登场,也在召唤着一种能从事说明更加广泛的各色人等和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各种条件的历史学。于是美国的‘新史学’派、法国的亨利·贝尔(Henri Berr)和比利时的亨利·皮伦涅(Henri Pirenne)的圈子⑧以及一般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都从不同的角度转而求之于他们特殊的社会科学概念作为是历史学家整个工作的一部分。当政治史和外交史的传统史学形态直至 1945 年之后还在左右着历史学这门专业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却越来越给予了社会史。特别是 1945 年以后,有体系的各种社会科学就开始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我二十年前的那部书就描述的是这场转变。

然而有关社会科学历史学所赖以立足的近代世界的性质及其方向的那种乐观主义,却被晚期工业世界社会存在的结构的根本变化所深深动摇了。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家们要比兰克学派更加动力学式地在构思现代世界。他们把不断的经济增长和把科学的公理化应用于调整社会,把它看成是在规定着现代世界的正面价值。

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类有关历史行程的假设,就已经受到雅各布·布克哈特⑨和弗雷德里希·尼采⑩的毁灭性的批判。

这类悲观论调在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反覆出现在论述近代文化状态的哲学讨论与反思之中，然而直到六十年代它们并没有认真地影响到实践的历史学家们。60年代对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这时候长久以来就在酝酿着的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危机意识才达到了一个高峰。只是到了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创造的种种条件才变得明显起来，其中包括各殖民帝国的结束以及更多地意识到各个非西方的民族也都有其历史^⑪。在西方社会之内，古老的、为50年代的著作所重复着的那种民族一致的概念^⑫，就被已经确认了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分歧性所取而代之。麦克·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的《另一个美国》(1961)^⑬勾绘出了与丹尼尔·博尔斯汀(Daniel Boorstin)^⑭这类的历史学家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⑮这类的社会学家所持的乐观主义观点大为不同的另一幅美国社会的画面。然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在一个日愈意识到了诸如性别、种族、种群性和生活方式之类的其他分歧的环境里，看来却显得不合时宜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移，更进一步影响了人们的意识。人们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了经济增长的消极面及其对环境稳定的威胁。这场浩劫的全盘冲击并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立刻就进入到公共意识里来的，而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后，当时新的一代获得了一种批判的眼光。文明化过程的毁灭性质就日益进入了人们意识的中心。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场意识上的转化有着好几种后果。对于许多人来说，则它标志着“宏伟的叙事”^⑯的终结。西方看起来越来越只不过是许多文明之中的一个罢了，这许多文明没有一个可以声称占有首要位置。同样的是，现代性便丧失了其

独一无二的品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相当早的时候就谈到各种文明的多元性，然而在他看来所有的文明都遵循着同一种发展模式^{①7}。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早在二十世纪的 30 和 40 年代就已经从追循事件序列的叙述历史学转向到考察一个特定时段的情况的历史学。^{①8}布克哈特则从另一个大为不同的角度，已经试着做类似的事情了^{①9}。而且即使是一个特定的时期也并不就构成成为一个整体单元，正如布罗代尔从三个不同的时间角度来审视十六世纪时所强调的那样^{②0}。在牛顿那种意义上作为一个客观实体的时间或是康德那种意义上作为一种普遍的思想范畴的时间，已经是不复存在了。对布罗代尔而言，历史时间是随着它所研究的主题而变化的，每个时间都以不同的速度和节奏在变化，——无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是自然的或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历史在其中经历着渐变的那些大跨度的结构，还是政治史上的急速跳动。何况即使是在一整套社会模型之内，各种不同的时间概念也是同时并存并且互相竞争，正如雅各·勒·高夫(Jacques Le Goff)区别了中世纪教士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那样^{②1}，或是爱德华·汤普逊(Edward Thompson)关于新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中前工业的时间之与工业的时间相对立的见解那样。^{②2}以往被排除在历史叙述之外的那些部分的人们——其中主要的是妇女和少数种族——的申诉，新导致了新历史学的创立，那有时候是被併入到更大的叙述之中，然而往往倒是脱离于其外。

历史学主题的这种片断化，其本身并不构成为对历史兴趣的摒弃。过去的三十年之中，历史著作的范围在许多方面都已经极大地扩展了。新的历史学确实在挑战专注于政治社会精英

的传统历史编纂学，并要求把长期以来被忽视了的各色人等也都包罗在内。他们提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历史学”，那不仅是把妇女包括在内，而且还引入一种女性主义的观点。他们也面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路数挑战；社会科学的研究路数把巨大的非个人的结构置之于历史的中心，这样一来也就并不比古老的政治历史学能更多地质询现存的权力关系。如果说社会科学取向的历史学曾经力图以对社会的取代对政治的研究的话，那么新的历史学就转向研究被人理解为是日常生活与日常经验的条件的文化。根据这一观点，马克思主义之强调政治和经济是权力和剥削的场所的那种中心作用，对于活人的现实利益和关注来说也就始终不可动摇。过去的三十年里倒不是人们的历史兴趣衰退，反而是看到了一场历史著作的真正爆炸。各色人等都在力图脱离更大的、传统的民族整体之外而确立自己的身份。

关于究竟有没有可能进行客观的历史探讨这一疑问，就成为一项更严重的挑战。对西方文明的性质的幻灭感，日愈造成了一种对现代科学观的深刻反弹。人类学家诸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人，不承认现代的科学合理性对“野性的”神秘思想之寻求与人生达成谅解能提供任何方便。^②从十九世纪 20 年代兰克对史料考订的系统化工作直到二十世纪 70 年代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之力图把历史学转化为一种以可量化的理论模型进行研究的科学^③，历史学家们都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可以接受有着明确规定的探讨方法的。这种信心符合于历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严格划分，也符合于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科学家的那种历史学家的工作方式与一个更为觉察到自己工作的文学特性的通俗历史读物的作家

的工作二者之间的区别。尼采在他早期的作品《悲剧的诞生》(1872)和《论历史学对人生的用处和不利》(1874)中,就否定了历史研究与学术性历史学的可能性和效用性。他相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被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偏好所决定的,而且自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所依据的信念——即存在着一种与思想家的主体性并无任何联系的客观真理——也是不可取的。对于尼采,正如对于他以前的马克思一样,知识乃是权力运作的一种工具。^②但是尼采并不分享马克思的这一信念:即,揭示已经进入知识之中的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就可以通向客观的知识。自从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理性的历史,在他看来似乎只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形式,只不过是肯定权威与权力的一种有效的工具。因此他就否认逻辑的(例如苏格拉底式的)思想对于前逻辑的(也就是神秘的或诗意的)思想的优越性。

从这一点出发,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就达到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历史学是更紧密地与文学而不是与科学相联系着的。这种想法就对近代历史学所赖以成立的假设本身提出了挑战。因为历史学并没有客体,所以历史研究就不可能有客观性;——这一观念已经越来越流行了。从而历史学家便永远都是他本人在其中进行思想的那个世界的囚犯,并且他的思想和感受是被他进行操作所运用的语言的各种范畴所制约的。于是,语言就形成了现实,然而语言却并不指向现实。^③这种观念特别出现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语言学理论和文学理论中间^④,尽管它所运用的基本语言概念早在斐迭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916 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就已经做出预示了^⑤,读书就把语言看作是一套自足的体系。罗兰·

巴尔特(Roland Barthes)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②和海登·怀特在二十世纪 70 年代^③都强调历史文本的文学特性以及它们不可避免地所包含的虚构成分。法国和美国的文学理论家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保罗·德·芒(Paul de Man)等人进一步发展索绪尔的语言乃是一套自足的符号这一概念,他们论证说:语言构成为现实更有甚于是指向现实。历史学家是研究文本的,但是这些文本并不指向外在世界。用德里达的名言来说:“除了文本之外,便没有任何东西”。^④文本并不必须具有一种书面的或言词的形式。人类学家例如克里福德·吉尔兹等人则主张,文化也是文本^⑤。而且不仅文本是非指示性的,并且它们也不具有毫不含混的意义。每一种文本都可以用无数的方式加以阅读。作者的意图已不再至关重要了,不仅因为它是多层次的和矛盾的,也因为文本是独立于作者之外而存在的。运用到历史学上面来,这就意味着归根到底每一部历史著作都是一部文学著作,它必须以文学批评的范畴加以判断。

这是自从巴尔特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对它加以总结以来在法国和美国的文艺理论界始终坚定地为人们所遵循的论证路线。巴尔特否认历史学和文学之间有任何区别,随之也就否认了——自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做出总结以来为西方思想界所普遍接受的——事实与小说虚构之间的区别。这种对历史学现实主义的批判,就被联系到对现代社会与文化的批判。因而巴尔特就抱怨说:“历史学论文的现实主义乃是普遍文化模型的一部分,……[它]指向一种正在对‘现实’异化的拜物教,人们借此力图逃避自己作为意义的创造者的那种自由和那种角色”。^⑥海登·怀特也以同样的思路提出:“人们迟迟不肯把历史

学的叙述看做就是它们最为明显昭著的那种样子：它们乃是言词的虚构，那内容更其是被发明炮制出来的，而不是被发见的，它们那些形式与其文学的对应部分、而不是与其科学的对应部分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④ 汉斯·克尔纳(Hans Kellner)把对近代社会所谓的权威的批判推得更远，他指责说：“‘真理’和‘现实’当然都成了我们时代首要的权威性的武器”。^⑤ 这就等于否定了自从古典的古代以来、而尤其是自从历史学研究的专业化以来，历史学家们进行历史研究的方式。正如罗伯特·贝克福弗(Robert Berkhofer)所出的：“正如正常的历史学家们都宁愿以参照事实而不肯以对如此这般的叙述的性质的论证来调协各种不同的解释，所以他们在实践上就必定假设事实性具有着某种强制性的现实”。既然否定了事实性，“当代文学理论也就鄙弃了流行的历史学实践的思想基础本身”。^⑥

然而坚持主张文本自立性的这些对历史现实主义的批评家们，却很少走出理论的陈述之外去面迎着对他们来说只可能是一种语言结构的具体历史题材。自命是“新历史主义”^⑦运动的拥护者们就更加直接地是和历史语境中的文字和文化打交道，尤其是通过其文学作品而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⑧ 打交道，也还与欧洲人遇到的新世界的原始居民打交道。^⑨ 这两组人都分享后现代主义有关语言的中心地位及其透明性的那种文艺理论的基本前提以及人类学把文化当做是意义的象征网络的那种概念。然而新历史主义者之拒斥文本自立性的观念，倒不如说是把文本看作反映部分地是以福柯式的术语而部分地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所理解的各种权力关系之复杂的符号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为他们的分析基础的那些文本，其信息是被自

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就一直在操作着整个社会的那种文化辩证法所提供的。对于他们,正如对于社会学家彼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一样,这些力量所采取的形式并不是物质的,而是在文化上可以沟通的符号资本。他们强调一切文字和文化的文本都有多重意义,同时又正像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者们一样,他们始终对于‘正规历史学’的实践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新历史主义”的创始人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所称之为的‘文化诗歌学’^④。

从二十世纪 70 年代至今一直在左右着历史学理论探讨的那些对公认的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激烈批判,已经对历史学的著作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却又很有限的冲击。假如我们接受这种批判的前提的话,那么有意义的历史著作便会是不可能的事。历史学显然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正如安克史密特(F. A. Ankersmit)所论证的^⑤,历史学家总得使用比喻来创造历史的形象。被他称之为兰克的以及社会科学取向的近代历史学和后现代的立场双方之间的分歧就在于:后者坚持每一个历史文本都有其隐喻的、非陈述的性质,而前者则有一种虚幻的信念,即在历史学家的诗文之外还存在有一种历史的实质。汉斯·克尔纳以一类似的思路曾把近代历史学研究的整个传统都看做是对古老的、把历史学作为一种修辞学形式的前近代的历史学观的一种歪曲。^⑥

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即使是专业化以前的历史学家们也都在把自己看做是辞章家,对他们来说历史学就包含有借鉴、人生的教诲,同时又在致力于述说一个真实的故事。而近来探讨的基调——例如 1995 年蒙特利尔“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的‘虚构性、叙述性、客观性’讨论会’^③——则是要采取一种中间的立场，亦即（正如罗杰·夏蒂埃 [Roger Chartier] 所概括的）虽则“历史学是许多种叙述的形式之一，然而在它对真实性保持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这一点上，它却是独一无二的。更确切地说，它那叙述的构造就是要重建一幅曾经真实存在的过去。这种诉之于先于历史文本而存在的、而又是处乎其外的真实，——而它那文本所具有的功能则是要得出一份可以为人理解的叙述来，——则是构成其为历史学并使之有别于故事或编造的东西”^④。

真实与虚假之间的这种区别，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始终都是根本性的。在近年来的批判思潮中，真理观已经变得无可估量地更加复杂了。肯定地说：“历史知识具有一种绝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条公理“已经不再是毫无保留地为人们所接受了”^⑤。然而真实性这一概念以及历史学家要避免作伪并要揭发作伪的责任，却一点也不曾被人放弃。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专家，他要继续批判地研究那些使人们接触到过去的真实成为可能的史料。在历史学的调研中，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对真实或客观性的抽象概念如何，而是在于对“历史学之作为一种阐释性的整体的观念、一种有着专业标准的学术实践的纪律的概念如何”^⑥。

从过去的现实逃入晚近的文学的、语言学的和历史学的思想之中，反映出人们对正在异化的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的深刻不满。就科学占有现代文明的中心地位而言，包括学术性历史学的近代传统在内的各种科学路线都遭到了攻击。当然，这种抨击也有政治的内涵。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前半叶由布克哈特

和尼采(尔后还有海德格尔)所开始的事业,乃是作为一种从精英主义的、反民主的角度出发在排斥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到了 1945 年之后,它又被像是让·保罗·萨特和法兰克福学派——提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 Adorno)和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这些思想家们举了起来;他们的立场通常被认同更密切地是左派的,但是他们不再把启蒙运动对理性和科学的信仰看做是解放人类的工具,而相反地看做是掌握和操纵人类的一种工具^⑦。如果说启蒙运动是力求把人类从神话和幻念之下解放出来,那么它的这些批判者们就是力求把人类从伦理上的毫无意义之下解放出来,在他们看来伦理上的毫无意义就包含在对人生和现实的理性的——或者说在他们的观点之中是理性主义的——思路之中。科学的理性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魔鬼。福柯和德里达都同意,自从苏格拉底以来西方的哲学传统由于把抽象的理性置于中心地位,已经把统治权的模型给合法化了,^⑧而对于从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写作的若安·司考特(Joan Scott)来说,那还在日常谈话的语言本身之中确立了父家长的权威^⑨。

这种后现代的批判包含有非常重要的有效论点。它指出了单一的历史观是不可取的,历史不仅是被连续性、也是被各种断裂所标志着的。批评者们正确地指出了,在专业历史学研究占有统治地位的话语之中已经嵌入了各种意识形态的前提。他们也正确地向它那些以专家的权威性在发言的种种夸张的说法提出挑战。然而他们却有要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倾向,他们否认有任何一种合理的历史话语的可能,并且质疑历史真实性的概念以及还有历史虚假性的概念。于是他们就不仅取消了

界于历史话语(它总是包含有虚构的成分的)和小说(它大多都是想要解说现实的)之间那条大家公认的流动界限,而且还取消了界于真诚的学术与宣传之间的那条界限。在近年来讨论这场作为一桩历史事实的大灾难*时,这种界限上的混淆已经变得格外令人困恼。^⑤把历史化解为纯想像的文学这一矛盾在海登·怀特的说法中来得十分明显 亦即,从道德的观点而言,否认大灾难这一现实是无法接受的,然而又不可能在一份历史叙述中客观地确定它是否曾经发生过。^⑥

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已经对历史学的思想和写作造成了重大的冲击,然而并未摧毁古老的概念与实践的连续性。后现代主义反映了一种转型中的社会与文化,其中有关工业增长、不断增加的经济期待和传统的中产阶级典范都已经动摇了。这一点已经反映在过去二十年的历史编纂学之中。历史学的主题已经从社会结构和历程转移到广义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上面来。随着新的注意力被给予了个人,历史学便再度采取了一种人情味的面貌,但这一次不是给予了上层的权势者而是给予了普通的百姓。有一派历史学家已经力图以他们所称之为的微观历史学来取代对宏观历史和宏观社会过程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的小小的社会单元上。对日常生活文化的这种新强调,就把历史学和克利福德·吉尔兹的人类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和马克斯·韦伯一道相信人是一种被悬挂在他自己所织就的那张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吉尔兹“就把文化当做是这张网,因此对它的分析就不是要寻求规律的一种实验的科学,而是在寻

*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译注

求意义的一种解释的科学。它是一种解说，……在诠释着表面上[是]谜一样的各种社会表现”，这便是文化学者们所追求的东西。因此，新的文化史也像古典历史主义的‘解释学’一样，它所关心的并不是说明(explanation)而是‘解释’(“explication”)，亦即企图重建作为它的文本的各种社会表现的意义。^②

然而新史学的解释学不同于兰克学派的解释学。兰克学派研究的不仅是一个不同的主题，亦即在伟大的政治体制的结构中的领袖人物这一主题，而且还认为文本之中就包括有通过语言学的分析可以被重建出来的一种明确的意义。兰克及其学派一直相信历史学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哪怕是在主题上和方法上与各种解释科学的并不相同。而在新文化史看来，则国家的中心体制、教会和世界市场都已经坍塌了，文本的意义已不再是透明的，而是被打上了种种矛盾和断裂的烙印。

所有这一切都在支持后现代主义对客观性和科学方法观念的攻击，它以扫除历史的叙述与虚构的叙述二者之间的区别而告结束。然而对过去二十年的历史学进行一番检察——这是我在本书中所从事的工作——却在提示我们：尽管历史学家们在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信仰上变得越发地小心翼翼，然而他们却是怀着这种信念在进行工作的，即历史学家研究的是一个真实的而非想像中的过去，而这个真实的过去虽则只有通过历史学家心灵的媒介才能够接触到，但它却要求遵循学术研究的逻辑的方法和思路。引人瞩目的是：就在后现代思想越来越发质疑职业学者的权威时，历史学的工作却感受到越来越大的职业化压力。虽则二十世纪的晚期也有‘历史学工作组’运动^③在号召大学以外有兴趣的公民们去寻找自己的根，但事实上新的文化史